

痿疾只单独取阳明。如果说治痿单独取于阳明,那么,就与后文“各补其荣而通其俞”的“各”字,自相矛盾。既云“独”,就无所谓“各”。所谓“各”,是要在各个不同的脏腑经络中分经取穴,要根据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,辨别虚实,适当补泻,审察逆顺,调和气血;还要因时制宜,各以其时受月而治。况且,《痿论》之论痿有五:“肺热叶焦,……则生痿蹙”;“心气热,……虚则生脉痿”;“肝气热,……发为筋痿”;“脾气热,……发为肉痿”;“肾气热,……发为骨痿”。治疗当从所病之脏而异。诚如张景岳所说:“盖治痿者当取阳明,又必察其所受之经而兼治之也。”

除此之外,《内经》中论痿甚多,湿热、寒湿、燥气、血气虚衰,以及情志所伤,均可致痿。后世医家在《内经》论痿的基础上,更有诸多发挥:张仲景云汗、吐、下太过致痿;朱丹溪还认为有湿痿致痿;李中梓又认为有食积致痿、死血致痿。所以治痿方法甚多,凡此种种,岂可言独取阳明一法而治诸痿乎?

由是可言,“治痿独取阳明”固为治疗痿疾的重要方法之一,但它决不是治痿的独一之法。应该肯定,治痿取之阳明,是治疗痿疾的一个重要方法。一则阳明胃腑为水谷之海,二则阳明主润宗筋,若阳明胃虚则宗筋失养而纵,宗筋纵则足痿不用。故综观《内经》原文,笔者认为,治痿并非独取“于”阳明,总要“观其脉证,知犯何逆”,而“随证治之”。

湖南中医学院 熊继柏

关于伤寒“三纲鼎立”之说

编辑同志:读您刊连续刊载的有关伤寒学之论述,很有受益。现结合阅读一些医家的《伤寒论》注释和吾师之教诲,试对“三纲鼎立”学说之沿革初步整理,望前辈指正。

仲景治伤寒,大要以寒邪外客,由表及里,产生传变诸证。太阳为诸阳之主气,风寒侵袭,首犯太阳,故细究太阳经,若能截邪于此,毋犯它经,则病可速愈。太阳一经,又以麻、桂、青龙为要,至于其余诸汤证则为传变辅佐而设。历代前贤为了读者能提纲挈领地学习并掌握《伤寒论》的实质内容,曾致力于“三纲”的研究。溯源这一学说的形成,晋·高平王叔和首先提出:“风则伤卫,寒则伤营,营卫俱伤,骨节烦疼”,可谓三纲说之渊源。唐·孙思邈细嚼斯语,悟出:“麻、桂、青龙”三方三法——风伤卫,桂枝证;寒伤营,麻黄证;营卫俱病青龙证。宋·成无己进一步予以阐发曰:“卫为阳,营为阴;风为阳,寒为阴。同气相求,故风伤卫,寒伤营,风寒俱中伤营卫。”到明朝

方有执,修言错简,将“风伤卫,寒伤营,营卫俱病”蔚为三纲,并用之以订正《太阳篇》,分列“卫中风”、“营伤寒”、“营卫俱中伤寒”三篇。凡桂枝证及其变证一类的条文,列于“卫中风篇”;麻黄证及有“伤寒”二字列于条首的条文,别为“寒伤营篇”;青龙证及“脉浮紧”、“伤寒脉浮”诸条文,汇为“营卫俱中伤寒篇”。方氏认为伤寒六经,“有纲有目,经为纲,变为目,六经皆然”。清初喻嘉言大倡斯说,并发展而成“三纲鼎立”——“冬月伤寒为大纲,伤寒六经中,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,而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、寒伤营、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”。三纲鼎立学说从此形成。

自喻昌较完整地提出三纲鼎立学说之后,和者竞起。在方、喻影响下,清初张璐认为此乃是其中的大关键;而吴仪洛谓,唯独喻昌振举大纲,次详节目;章楠所著《伤寒本旨》,更是按三纲三法予以分篇;清人钱潢,在他所书《伤寒溯源集》的六经分证中,始终贯穿了三纲说,认为不论三阴三阳,都有中风伤寒的问题。其他赞同三纲鼎立学说者不乏其人。

对此说第一个持反对态度的,乃是钱塘二张之一——张志聪。张氏对成无己所说:“风伤卫,寒伤营”,引用了《内经》“风寒客于人,起毫毛而入腠理”之说,谓非必风伤卫,寒伤营。柯琴则谓,大青龙乃麻黄汤加味,为伤寒中风,无汗烦躁而设;风寒伤营卫,不能截然分开,只是孰多孰少而已;认为三纲鼎立说,乃巧言簧簧,郑声以乱雅乐。清人尤在泾不以三纲印定眼目,而是将三阳统以正治、权变等八法;并将太阴分经脏;指出少阴、厥阴亦各有温清诸法。他在《伤寒贯珠集》首篇即云:“寒之浅者,仅伤于卫;风之甚者,并及于营。”而关键在于人体卫外之气的盛衰。卫强,伤风亦难汗出;卫弱,伤寒亦可出汗。故以有汗无汗以严麻黄桂枝之辨,不必执营卫孰虚孰实,以证伤寒中风之殊。纵观以上所述,应该说反对“三纲鼎立”说,在后世获得更多学者的支持。究竟谁是谁非,还有待于在临床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和总结。

甘肃中医学院七八级 司家亭

严用和籍贯的再推究

教学之暇,拜读浙江中医研究所文献组等整理的《重订严氏济生方》,获益非浅。严用和是宋代有卓越贡献的医学家,所撰《济生方》原著国内虽早已散失,而其中所汇集整理的方剂,曾被后世医家广为应用,可惜他的生卒年代和籍贯等,史料均无记述。本书的重新整理者,从流传于民间的抄本及散存于国内外有关医著中,深入发掘,广为搜集,并著文论述于

卷首,使我们了解到严用和生平事迹的端绪及其学术渊源之梗概,并得知严氏不仅是刘开的及门弟子,而且师徒同里。这些推考证,十分可贵。但又认定,严氏为江西南康县人,这个考证是失实的。为了避免以讹传讹,对严用和籍贯再作推究。不当之处,请同道指正。

历史上,江西有两处叫“南康”的地名:一为南康县,即现今赣州地区的南康县;一为南康府,在庐山南麓,包括现今九江地区的星子、都昌、永修等三县在内。严用和既与刘开是同里师生,而刘开我们从《医籍考》、《医部全录·医家名流列传》等资料中得知为南康府人,则严用和亦为南康府人是毋庸置疑的。况且,严用和撰作自序亦署“庐山严用和”。再从江万写的序文来分析,亦谓:“吾邦庐阜之产,不特多大儒名士,以医知名……盖刘严氏也”。这也说明刘开、严用和祖籍都在庐山一带。

古代庐山的行政归属,宋以前归江州德化县管辖(德化即现今的彭泽县,德化这个县名,从五代南唐时起,一直沿用到民国初年)。但是,从宋朝初年开始,庐山的归属有了变化。宋·太平兴国三年(公元978年),庐山南麓的星子镇升格为县,但仍属江州管辖。太平兴国七年(公元982年),星子县改属南康军(宋时军与府为同一级行政单位,宋时的南康军,在元时称南康路,明清两代称南康府),从这时开始,庐山北部属江州德化县,南部属南康军星子县,一直到民国初年,撤销州府一级行政建置为止,近一千年来,庐山为两府两县所分治(参见周奎书,《庐山史话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1年版),严用和为宋代医家,既为南康府人,又自署“庐山严用和”,由此不难推断出他们的籍贯应该是庐山南麓南康府星子县人,即现今江西九江地区星子县人。何况现今的南康县,在历史上隶属于南安府。南安府管辖大余、南康、崇义、上犹四县,焉得把相隔千里的南康府与南康县混为一谈。上述南康府、县建置情况,只要查阅南康府志和南康县志就会明白。即使资料不足,查考一下《宋史》也会一清二楚,但是,《济生方》的重新整理者没有深入调查,府县不分,所以张冠李戴了。由此进而推论,本书编者在整理严氏生平事迹及学术渊源时所说:“(严用和)撰著时称庐山,或其医迹所及故也”,以及“医迹逾千里,为南宋南康(现江西南康县属赣州地区)庐山一带颇具声名的医家”等等话语,都是因为对庐山历代沿革缺乏了解所作的臆断。

至于古人作序文、写跋语,落款时一般都要加上自己的籍贯。庐山既不是县名,且又为两府两县所分

治,那末严用和为什么要自署“庐山严用和”,而不自署“星子严用和”呢?这是因为“匡庐奇秀甲天下山”,不少名人学者都在庐山留下足迹,也留下了流连觞咏的诗篇。严用和以此为荣,所以撰写自序时就署名“庐山严用和”。由于籍贯是医家生平中重要的内容,为此不揣浅陋,敢陈管见。不当之处,请同道斧正。

江西医学院 傅幼荣

并非汪昂的记误

编辑同志:您刊1982年第9期“园地”刊登的《医方集解》中汪昂的记误一文提出:汪氏著作《集解》时,在“凡例”中将“成无己”误作“陈无择”了。其理由是:汪昂在“凡例”第1条中有:“……及宋·陈无择将仲景之书,先释病情,次明药性,使观者知其绪端,渐得领会。……而世犹以循文训释讥之……。”因而认为,汪昂错将注解《伤寒论》的成无己,误记为撰《三因方》的陈无择了。其主要根据即陈氏《三因方》并未涉及仲景之书,而后世对陈无择也无“循文训释”的说法。加以“成无己”和“陈无择”二名,前二字音同似,所以汪昂张冠李戴了。

笔者认为,这一说法值得商榷。因为:经笔者查阅《医方集解》,其中应用成氏注解《伤寒论》中并没有上述记误。同时《集解》中应用成氏注解《伤寒论》方有13首,引用其中条文达15条;应用陈氏《三因方》之方剂10首,引用条文也有15条之多。可见汪昂对成、陈二氏及其著述相当熟悉;且汪氏学识渊博,治学严谨,我想也决不会有如此“记误”。再者上文提出,陈无择《三因方》并未涉及解释仲景之书,这也与事实不符。其实《三因方》将病因、病证、方药一线贯穿,正是对仲景方书的发挥和运用,何况连“三因”都是仲景在《金匱要略》中首先倡导的呢。以上看法,不知当否?

新疆玛纳斯县兰州湾公社

侯延琦

下桥子大队二队卫生所

·我的补正·

编辑同志:拙文原提到《医方集解》凡例将“成无己”误作“陈无择”,乃“汪昂的记误”。经有关学者查阅《集解》多种版本、汪氏自序和康熙壬戌刊本残卷“凡例”皆为“成无己”,可见上述“记误”,乃后来若干版本之“误”。又,我原来提出,《三因方》一书“未涉及解释仲景之书之论”也欠妥。侯延琦同志评之中窍,深得教诲,谨表感谢,并一一补正。

山西省交城县手工业职工诊疗所 石宝宝